

定额制度与区域文化的发展

基于清代长江三角洲地区学额的研究

梁志平 张伟然 著

漓江出版社

定额制度与区域文化的发展

基于清代长江三角洲地区学额的研究

梁志平 张伟然 著

漓江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定额制度与区域文化的发展:基于清代长江三角洲地区学额的研究/梁志平,张
伟然 著. —桂林:漓江出版社, 2013. 12

ISBN 978-7-5407-6830-0

I. ①定… II. ①梁… ②张… III. ①教育制度—研究—中国—清代 IV. ①G529.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66494 号



组稿: 庠文妍

责任编辑: 许莉 杨志友

封面设计: 李晓锐

出版人: 郑纳新

漓江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22 号 邮政编码: 541002

网址: <http://www.lijiangbook.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销售热线: 021-55087201-833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印刷

(山东临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华路 邮政编码: 276017)

开本: 960mm×690mm 1/16

印张: 10.75 字数: 149 千字

2013 年 12 月第 1 版 201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45.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承印单位联系调换。

(电话: 0539-2925888)

本著作受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学术著作出版专项资助

序

本书是在志平当年的硕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修改、扩展而成的。论文选题出自我的建议；初稿出来后，我又逐字逐句跟他一起讨论、修改，这样定下来的内容有六万多字。他毕业后，出于客观需要，我们合署发表过两个单篇。现在以专著形式出版，自然未便单署他的名字。尽管那以后他独力做过不少后续工作，现在也收在这本书里面。

最先注意到学额问题，是在我博士毕业后不久。在读《曾国藩家书》时，咸丰八年八月十四日曾国藩给曾国荃一函的附片引起了我的极大关注：

次青一军欠饷二十万，断难弥补。次青乃设一绝妙之法，捐十万两请增广平江县文武学额各十名，又捐五万两请增广岳州府文武学额各五名。盖咸丰三年新例，捐银万两者，除各该捐生家给予应得议叙外，其本县准加文武学额各一名。去年今春，湖南办捐输加额一案，长、善、阴、浏、潭、醴六属各加学额十名（捐银至十万以上者，加额亦以十名为止）。湘乡加三名，平江加一名。盖湘乡仅捐三万，平江仅捐一万，为数甚少也。次青以此项应得之口粮银出捐，加县学十名、府学五名，真可俎豆泮宫，流芳百世。各勇闻可刊碑泐名于学宫，亦皆欣然乐从。此事若成，诚为美举。前此咸丰三年，平江以团防出力，加文武学额各三名，系次青所办，余咨（抚、学）而成者。五年，湘乡援平江之例亦加额三名。弟营现在欠饷若干？若欠至七八万以上，则与各哨弁勇熟商，令其捐出。捐得七万，可增文武学额各七名，合之今春新增之三名，亦为十名，与长、善、阴、浏、潭、醴六邑相等，合之五年特奏增额之三名，则共为十三名矣。弟若办成此事，亦可俎豆泮宫，流芳无既。若弟营不能捐出许多，则或倡捐二三万，余再劝迪、希、浚、凯、玉班诸君子各捐若干万两，凑成七万之数，

亦可办成此事,不让次青专美于平江也。^①

从中不难看出,曾文正对于为乡邦捐广学额一事极为重视。三天后,他又追加一函,称:

近来因学额一事,反复细思,若不趁此军务未竣、皇恩浩荡之时协力办成,将来即捐十万、二十万,欲求增一名学额,恐不可得。湘乡近年带勇剿贼,立功各省,极美极盛,而广额反不如长、善、阴、浏、潭、醴、平江之多,亦不可谓非一阙典。^②

心情如此急迫,学额作为一种社会文化资源的稀缺性毕显无遗。

之前在研究历代科举人物地域分布差异时,对于其地域差异形成的原因总觉得很难分析透彻,至此突发奇想:很可能与学额不无关系。

两年后的一个中午,与学兄曹树基教授在校园附近的小面馆里畅谈,我向他汇报了这一想法。他很有感触,给我讲了一个故事。他说当年投考谭其骧先生的博士生时,因为他是江西人,先生在面试中问了他一个问题:宋代江西、福建文化极盛,但到了明清江南兴起后,江西、福建都衰落下去了,这是怎么回事?他说那之前他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仓促之间回答得不好;现在想来,应该就是“额”在其中起到了作用。

我感觉很对,这就是传统中国作为农业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蛋糕就这么大,你切多,我就少了。民歌里传唱了几百年的“月子弯弯照九州,几家欢乐几家愁,几家夫妇同罗帐,几家飘零在外头?”,反映的也正是这么一个现实。

前些年不少人研究中国历史上的灾害与社会,颇有人认为中国传统的灾荒文化是守望相助、全社会动员。我不否认确实有这个层面存在,但我同时也注意到另一个层面,那就是每当灾害来临,中国历史上首先开演的往往是

① (清)曾国藩:《曾国藩全集·家书》第0278封《致沅弟》,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第415—416页。

② (清)曾国藩:《曾国藩全集·家书》第0278封《致沅弟》,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第417页。

一些以邻为壑,甚至趁火打劫的惨剧。——近数十年来,由于一些有志之士致力于将中国传统文化的老根刨掉,传统农业社会的特征正在弱化,文化中的这些消极因素连同积极因素一道都在被慢慢扬弃、改造,这是令人五味杂陈、不知何从自处的。

且不管那么多,却说我发现这个问题后,多少年腾不出手来收拾它,直到志平来跟我读研。

志平本科毕业于湖北大学,专业是政教。我认为这样的背景对于研究历史上的定额问题是极有帮助的。事实证明,把这个课题交给他实在是找对了人。

志平具有很强的工作能力。他善于将任务分解成一个个具体步骤,然后分而治之。这一点,在他做博士论文的过程中表现得最充分,但这方面的能力早在他做硕士论文时就已经初露端倪。他还具有很强的自我完善能力。刚开始这一工作时,不要说对学额,就是对长三角的历史地理背景都了解不多;他从最基本的历代政区沿革摸起,各方面扩充自己的专门知识。包含制度的、文献的、分析工具方面的。他绝不满足于仅仅从方志、政书中抄录一些数字,列表统计一下了事;他还积极搜寻当事人留下的一些回忆录,力求从运作层面把握一个制度的实态。在这样的基础上,再考量统计结果、各因子之间的相关性等较宏观的问题。

他的工作虽然以长三角为空间范围,但目光绝不局限于长三角。我跟他讨论时,他常举出一些其他地区的例子,尽量避免从局部经验事实出发、产生过于偏颇的结论。

我常感慨,一个研究生要想在科研上做出较大成绩,应该选一个导师有感觉,但并没有做过的题目,不然就很难做出独创性较强的工作。谭其骧先生当年指导博士生,基本上都是这么做的。而题目确定后,是机械地完成任务了事,还是积极主动地思考问题,将自己带入到研究者的角色,这中间的结果差天远地远。志平从一名生手,到积极参加科举学界的学术活动,并自主地做出一些后续研究,这种工作态度是我感到十分欣慰的。

当初我意识到学额问题的重要时,对它所可能产生的影响,从学术上相当于一种假设。现在这一假设通过本书已得到初步验证,在此无须赘言。要

指出的是,由于中国的疆域如此广阔,各地社会文化状况千差万别,同一种制度在不同地域的运作效果绝不可能等同,希望将来能有其他地域的同类研究成果出现,以期得出更全面的结论。

此外,我还有另一个期望。近年来,我常痛切中国文化正在走向一个与传统偏离相当大的方向,在这过程中,基本上就是“文”的东西越来越少。以致有些人将今证古,以为在古代已然如此。其实不然,我们中国本是一个有“文”化的国家。不管做什么,我们都要有所讲究——要有说法、有依据,而且还要尽可能地说得漂亮。这就导致事实与表达往往形成不同的系统,在制度文化层面表现得尤为明显。例如,唐代的行政制度在大部分时间里是州县制,只在玄宗天宝(742—756)至肃宗至德年间(758—760)更为郡县制,但在载籍中,称州与郡完全等效,一视行文需要而定。到了明清,高层政区本来无“省”,但民间习称之为“省”,因而也就沿元代之旧而不改。至于各省的专名,更是五花八门,不一而足,只要不生误解就行。例如,“福建省”可称“福州省”,“陕西省”亦可称“西安省”“,”“湖南省”可简称为“湘”、为“楚”,这些称呼均可施之于正式文书,换在今天,简直不可思议。

我希望将来能有越来越多的人从事这种基于中国独特文化制度的研究,从一些具体而微的事实出发,寻绎其中的精神实质,并考量其在不同地理条件、不同社会环境中的变化,如果能得出一些合乎人情事理的认识,无疑将大大有助于重新认识中国文化传统的价值。

张伟然

2013年8月15日

于复旦大学光华楼

目 录

绪论	1
第一章 为何是清代:学额、解额关系的历史分析	9
第一节 唐代:学额与解额的分离	9
第二节 宋代:学额与解额的分离和统一	10
第三节 明代:学额、解额走向统一	13
第四节 清代:学额与解额的高度统一	15
第二章 清代长三角地区学额总例	19
第一节 清代府州县学定额通例	19
第二节 清代长三角地区学额总例	21
第三节 清代长三角地区其他籍学额总例	27
第三章 清代长三角学额的考订与地域差异	29
第一节 1646—1689 年长江三角洲地区各学文生取额考订	29
第二节 清代长三角地区学额变化与差异	37
第四章 定额非定额:特殊时期的缺额现象	51
第一节 缺额的数量分析	51
第二节 缺额原因分析	61
第五章 清代解额制度及长三角举人、进士数量分布	68
第一节 清代解额制度变迁	68
第二节 长三角地区解额数量	73
第三节 学额与举人、进士数量的相关分析	75
第六章 学额的运作:学额定等、分割与增减	86
第一节 府州县学定额的依据	86
第二节 定额等级的确定及变化	87
第三节 学额的分割与增减	92

第七章 学额与清代科举冒籍问题	10
第一节 清代科举冒籍的主要类型	10
第二节 清代科举冒籍之流行	10
第三节 清代预防和惩治冒籍的措施	10
第四节 冒籍流行的主要原因	10
结语	11
附录一 也谈 19 世纪初期华娄地区的教育产业——与李伯重教授商榷	11
一 教育经费与统计口径	11
二 学额与教育规模、投入	11
三 修正后的教育规模与投入	12
四 结语	12
附录二 19 世纪初期华娄地区的教育产业——与李伯重教授再商榷	12
一 李伯重先生的“采纳与借鉴”	12
二 比较对象的统计口径	12
三 学额与教育规模、投入	12
四 结语	12
附录三 关于商籍学额答某编辑问	13
参考文献	13
后 记	15

图表索引

表 2-1	清代府州县学文额总例	20
图 2-1	1689—1724 年长三角各州县文生定额变化	22
表 2-2	清代江浙府州县学文额通例	23
表 2-3	清代江浙恩广学额	24
表 2-4	咸同间捐广学额通例	26
表 2-5	清代江浙商籍学额变化	28
表 3-1	长江三角洲地区清代文生学额变化过程	38
表 3-2	咸同时期长三角地区捐广暂额表	44
图 3-1	咸同时长三角各州县捐广永远文生定额	47
表 4-1	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光绪朝朱批奏折》所载文学缺额	54
表 4-2	《光绪朝朱批奏折》所载武学缺额	58
表 4-3	太平天国战争中江苏等七省的人口损失	62
表 4-4	上述表 4-2、4-3 各府学额定额变化与人口变化	64
表 5-1	清代长三角相关乡试额定录取人数增减略表	67
表 5-2	1645—1735 年江浙两省乡试取额	70
表 5-3	咸同时期江浙捐输乡试定额	72
表 5-4	咸丰光绪间江浙捐输加广乡试一次中额	73
表 5-5	1646—1724 年长三角地区举人进士数量分布	74
表 5-6	1690—1723 年长三角各州县进士、举人、学额相关分析数据表	76
表 5-7	1726—1760 年长三角各州县进士、举人、取额总数相关分析数据表	78
表 5-8	1870—1904 年长三角各州县进士、举人、学额相关分析数据表	81
表 6-1	清初杭嘉湖宁绍五府各州县学定额等级与中举人进士人数、钱粮丁口原额征范围	88
表 6-2	1724 年杭嘉湖宁绍五府各州县学定额等级与中举人进士人数、钱粮丁口实征范围	90
表 7-1	清代长三角部分州县学及专学童试竞争度	110

绪 论

一 问题缘起

在历史文化地理的研究中,一个引人注目却又令人大伤脑筋、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是:如果以盛产人物作为某地文化发达的指标,那么这种发达地区一直是在变动中的。这正应验了一句古老的俗语:“风水轮流转,明年到我家”。王士性对此曾有过一番很有意思的思考:

江南佳丽不及千年。孙吴立国建康,六代繁华虽古今无比,然亦建康一隅而止,吴、越风气未尽开也。……晋分天下十九州,吴、越、闽、豫,通隶扬州。唐分十二道,一江南东道,遂包昇、润、浙、闽,一江南西道,遂包宣、歙、豫章、衡、鄂,岂非地旷人稀之故耶?至残唐钱氏立国,吴越五王继世,两浙始繁。王审知、李璟分据,八闽始盛。然后宋分天下为二十三路,江南始居其八焉:曰两浙、曰福建、曰江南东、曰江南西、曰荆湖北、曰荆湖南、曰广南东、曰广南西,而川中四路不与焉。赵宋至今仅六七百年,正当全盛之日,未知何日转而黔、粤也?^①

自王氏至今,又已经400年过去。以今视之,应该说,王氏的预感并非全无凭据:何日转而至黔虽仍不可知,自近现代以来粤地得全国繁盛之先总归是一个昭彰在人耳目的事实。

这恐怕与中国历史上的定额制度有关:由于科举考试中发解和录取的名

^① (明)王士性:《广志绎》卷1《方輿崖略》,周振鹤编校:《王士性地理书三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240—241页。

额是有限定的,一个地方所占份额加多,其他地方自然要随之减少。显然,这正是传统农业社会中不太可能出现“共赢”,而往往发生“几家欢喜几家愁”式悲喜剧的思想原点。怎样才能在科举指标中分得较多的份额?一般说来,首先得保证有足够的参加科举考试的人数——当然不是所有参加各级考试的总人数,而是在相邻各地之间具有一定可比性的人数。不言而喻,“学额”、“解额”等正是影响了值得关注的与外地会发生竞争关系的科举人口。

在唐宋时代,贡举不必尽由学校,因而学额并未成为绝大问题;明清时期,科举必由学校,特别是在清代入学成为士子的第一级晋身之阶。得以入学的称“生员”(俗称“秀才”),入学考试称“童子试”,这一考试也便成为科举考试体系中最基础的一环。成为生员意味着获得“功名”而成为四民之首,享有若干政治、经济特权。因而学额堪称当时社会上第一等重要的社会文化资源。例如,咸丰八年(1858),曾国藩在家书中称道为乡邦增广学额之举是“俎豆泮宫,流芳百世”^①,清人俞樾亦称咸同军兴以来的捐广学额机会,“诚旷典也”。^②

二 研究范围及概念界定

本书就长江三角洲地区在清代的情形进行探讨。此所谓长江三角洲,除太湖流域外还包括江北的扬州及浙东的宁绍平原,以清代政区言之,为江苏的江宁、苏州、松江、常州、镇江、扬州六府及太仓直隶州、海门厅,浙江的杭州、嘉兴、湖州、宁波、绍兴五府。

在此,有必要对“解额”与“学额”这两个概念稍作解释。先说“学额”,从字面上讲,它指的是府、州、县各级官学每次录取学生的有关定额,但在不同时期学额的数量所指是有所不同的。如,明代主要是指廪生、增生的定额,清代则是指每次录取的定额,即额进人数。考生入学后称“生员”(俗称“秀才”),考生没有取得功名之前则称为“童生”。生员分为廪膳生员、增广生员和附学生员,廪生、增生是岁科两试中按名取前列者,每月有廪膳费,刚录取

① (清)曾国藩:《曾国藩全集·家书》第0278封《致沅弟》,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第414—416页。

② (清)俞樾撰,徐明、文青校点:《春在堂随笔》卷四,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46页。

入学的生员称附生。^①故而,在清代学额是指官学每次额进的定额,也就是附生,这才是清代科举童子试录取的关键;至于廪生、增生虽有定额,但它只是岁科两试对附生的排名而已。

《学政全书》、方志之类的资料在记载“学额”时往往包括额(取)进人数、额(取)进生童、廪膳生员(廪生)、增广生员(增生)、附学生员(附生)等内容,也许是因为如此,至今许多科举学、明清史研究学者好像对清代“学额”的具体所指有些模糊:刘海峰、李兵先生把廪生、增生名额当作清代学额^②,李润强先生^③、李伯重先生^④亦同,而杨念群先生则把清代会试名额当作学额^⑤。当然,从定额这一点来讲,廪生、增生也可以看作是学额,但它不是每次童子试(院试)录取的人数,因而不是区域文化发展的制约因素。

所谓“解额”,指的是各地解送礼部参加全国统考的贡生数额。唐宋时代,发解试主要由州府举行,获得解送资格的举子并无固定身份。明清时期,发解试率于各省举行,称“乡试”,取中者为“举人”;举人可以参加任意一科的礼部“会试”,即使不中式也不必再应乡试,因而举人成为生员之上的一级功名,解额也便成为各省各科乡试录取的名额。

需要说明的是,科举体系中科目众多,本书只讨论进士科系统。此外还有其他种种科目,由于其社会影响及文化含量都不足与进士科相侔,在此且不予考虑。

三 学术史回顾

以往关于清代学额的研究已颇有不少。较早的是张仲礼先生在其以英

① 参,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第一章“童生之考试、生员及生员系内之各种考试”,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8年,第1—47页。

② 刘海峰、李兵:《学优则仕:教育与科举》,长春:长春出版社,2004年,第191页。

③ 李润强:《清代进士的时空分布研究》,《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第62—68页。

④ 李伯重:《19世纪初期华娄地区的教育产业》,《清史研究》2006年第2期,第60—74页;李伯重:《中国的早期近代经济:1820年代华亭—娄县地区GDP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435页。按,李伯重先生的错误,笔者曾在拙文《也谈19世纪初期华娄地区的教育产业——与李伯重教授商榷》(《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9年第2期,第90—91页)中指出。与拙文发表几乎同时,复旦大学历史系黄敬斌先生亦发现李伯重将廪生、增生当作学额的错误,参,黄敬斌:《民生与家计:清初至民国时期江南居民的消费》,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47—248页。

⑤ 杨念群:《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三大知识群体互动的比较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第273页。参,沈登苗:《评〈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兼论世纪之交的学风问题》,《社会科学论坛》,2001年第11期,第23—24页。

文撰写、1955年于西雅图出版的《中国绅士——关于其在19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①一书,以学额为钥匙估算了1850年前后各省绅士阶层的人数。1989年,王跃生先生发表《清代“生监”的人数计量及其社会构成》和《清代科举人口研究》两篇论文^②,其中也牵涉到学额问题。然而,就研究内容和所用资料、方法而言,王文与张著基本上类似,但以精细程度言之,后者较前人尚有所不如。2004年,阳信生亦利用张著方法进行统计分析近代湖南绅士的数量^③。在这些研究中,各位学者都是将学额视为常数,然后进行数量推断,其旨趣并不在学额制度。

1999年,李世愉先生推出《清代两次大规模增广学额之比较研究》一文^④,对乾隆及咸同间两次大规模增广学额进行了相当细致的描述和比较分析,虽然对广额的操作程序有简要的概述,但是对学额数量的由来及其运作具体的工作尚待开展。

新近,谢海涛先生专注于中国古代科举录取名额问题研究(7—20世纪)学额问题自然是其关注的焦点。如,在《中国古代官学中的学生数量问题研究——以科举学额制度发展演变的历史为中心》^⑤一文中,谢海涛先生对历代学额数量问题进行了梳理;而在《中央与地方的交换:晚清咸同年间科举录取名额的增加》^⑥一文中,谢海涛先生则对太平天国战争后学额的变化过程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对张仲礼、李世愉先生的一些看法提出了不同意见,不过,就笔者看来,谢海涛先生对咸同年间的增广学额问题的理解似乎存在一些

① 张仲礼:《中国绅士——关于其在19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出版社1955年英文版,该书中文版1991年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

② 王跃生:《清代“生监”的人数计量及其社会构成》,《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1期,第40—47页;王跃生:《清代科举人口研究》,《人口研究》,1989年第3期,第42—47页。

③ 阳信生:《湖南近代绅士的计量分析》,《中国地方志》,2004年第7期,第54—60页;阳信生:《湖南近代绅士阶层研究》,长沙:岳麓书社,2010年,第54—76页。

④ 李世愉:《清代两次大规模增广学额之比较研究》,《清史论丛》,1999年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311—345页;亦见李世愉:《清代科举制度考辨》,沈阳:沈阳出版社,2005年,第177—208页。

⑤ 谢海涛:《中国古代官学中的学生数量问题研究——以科举学额制度发展演变的历史为中心》,《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第94—99页。

⑥ 谢海涛:《中央与地方的交换:晚清咸同年间科举录取名额的增加》,《清史研究》,2009年第4期,第44—55页。

偏差。^①

对解额的讨论较之学额更多一些,研究科举制度的论著大多对此有所涉及。其中,引人注目的是两位女学者的研究。台湾的林丽月于1992年发表《科场竞争与天下之“公”:明代科举区域配额问题的一些考察》一文^②,对明代解额的变动及乡试竞争程度的地域差异作了相当深入的揭示。2000年,韩国学者裴淑姬发表《论宋代解额的实施与地区分配》一文^③,论述了宋代解额制度的演变及实施过程中的地域不平衡。新近,汪维真先生推出《明代乡试解额制度研究》一书^④,对明代乡试解额制度形成的轨迹、区域解额配置变动的原因进行了系统研究。

对于清代解额问题,近年来,刘海峰先生给予了足够的关注,先后并正在指导多位博士生、硕士生进行研究^⑤。据说刘海峰先生有一个宏大的计划:指导研究生按照省份,逐个研究清代的乡试问题,以期获得清代乡试的整体状况,其中有的已成专著出版。^⑥

“科举学”的研究已极为深厚,以上研究为笔者进一步探讨解额、学额与区域文化发展之间的关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四 研究资料及方法

科举制度作为我国封建社会最为重要的制度之一,相关文献资料自然异常丰富。下面就本书使用的主要资料进行简要说明,相关研究资料基本可以分为以下四类:

一是各类政书。学额、解额作为科举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官方的政书

^① 参,梁志平:《咸同年间江南地区的捐广学额活动》,《求索》,2012年第4期,第107—110页,后文会对此问题展开详细论述。

^② 林丽月:《科场竞争与天下之“公”:明代科举区域配额问题的一些考察》,《台湾师大历史学报》,1992年,第20期;亦见邢义田、林丽月主编《台湾学者中国史研究论丛·社会变迁》,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年,第319—348页。

^③ (韩)裴淑姬:《论宋代解额的实施与地区分配》,《浙江学刊》,2000年第3期,第121—127页。

^④ 汪维真:《明代乡试解额制度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

^⑤ 赵娜:《晚清顺天乡试研究》,厦门大学硕士论文,2006年;刘希伟:《清代山东乡试研究》,厦门大学硕士论文,2008年;姜传松:《清代江西乡试研究》,厦门大学博士论文,2009年;田书清:《明清贵州乡试研究》,博士论文在研(2012年开题),等等。另,许静:《清代湖南乡试研究》,湖南大学硕士论文,2009年,虽然导师为李兵教授,但李兵先生的博士论文导师正是刘海峰教授。

^⑥ 如,姜传松:《清代江西乡试研究》,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

自然是极为重要的史料,如:《学政全书》、《科场条例》、《礼部则例》、《会典事例》,等等,清代在多个时期都有修撰,好在这些资料都有影印出版,查找起来比较容易。

二是奏折、上谕。学额、解额制度在清代不同时期还是有不少变化,要了解学额、解额在政治生活中的运作过程,奏折、上谕是十分重要的史料,里面保留了大量原始资料,如已影印出版的《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光绪朝朱批奏折》等。

三是方志。学额、解额作为关系地方福祉的重要制度,是方志记载的基本内容之一。笔者主要利用台湾成文出版社影印方志、大陆影印出版的地方志集成,《稀见中国地方志汇刊》(中国书店1992年影印本)、《故宫珍本丛刊》(海南出版社2000年影印本)、《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年影印本)、《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续编》(北京图书馆2003年影印本)、《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藏稀见地方志丛刊》(北京图书馆2005年影印本),及少量线装方志,系统地查找了本书所研究的长三角11府1州1厅共216种方志,找到大量的资料,这些史料很多可以和政书、奏折中的记载进行对比研究。

四是笔记、回忆录。学额、解额在清代的文人笔记中也有大量的相关记载,如陈康祺的《郎潜纪闻》、法式善的《清秘述闻》、福格的《听雨丛谈》、梁章钜的《浪迹丛谈》、俞樾的《春在堂随笔》,等等,当然清代文人笔记众多,笔者主要查找了一些代表性的笔记。另外科举亲历者的回忆录也是非常重要的资料,如钟毓龙的《科场回忆录》(浙江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蒋梦麟的《西潮》(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齐如山的《中国的科名》(辽宁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商衍鎤作为1904年清朝最后一次科举考试的探花,其撰写的《清代科举考试述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8年版),本身就包含着个人的亲身经历。

总之,科举文献异常丰富^①,以上只是本书利用的主要资料。在研究方法

^① 具体可参,杨学为主编:《中国考试史文献集成》,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马骥:《中国古代教育文献概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陈文新主编:《历代科举文献整理与研究丛刊》,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等等。